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Governance

善政思想与治理创新

主编
郑万军

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

——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

李 锋 | 著

古代思想家对治理道德基础的追问，也是当今理论界所要回答的问题

两宋理学家提升了德治主义治理学说的哲理化程度，为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提供了完备的证明

非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善政思想与治理创新

主编
郑万军

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

——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Governance

李 鋒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 /
李锋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

(善政思想与治理创新)

ISBN 978 - 7 - 5201 - 3304 - 3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政治伦理学 - 研究 - 中
国 - 古代 IV. ①B82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2858 号

善政思想与治理创新

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

——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

著 者 / 李 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晓霞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304 - 3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善政思想与治理创新”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名)

顾 问 朱光磊 周光辉 徐 勇

主 编 郑万军

编 委 刘昌雄 宋玉波 张邦辉

陈 跃 吴 江 邹东升

周学馨 周振超 谢来位

总 序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历经四十余载的改革开放，中国迈入了新时代。实践是理论孕育、生发的沃土，伟大的实践需要理论的阐发与擘画。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就已积极投身创作迄今世界最为宏大的民族复兴史诗，尽管这一历史巨作时下方入佳境。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既需勇于实践创新，又要及时进行理论建构，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回应时代需求，是每个学人的责任与荣耀。作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青年学者，应自觉融入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为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尽绵薄之力。基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善政思想与治理创新”丛书。

“善政”是古往今来治国理政的不懈追求，亦是国家或政府优良与否的评判标准。自夏商国家初成以往，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治理经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充分发掘中华民族先贤智慧的滋养功能，还应秉持国际视野和全球胸怀，善于在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激荡、交融、扬弃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坚定中国道路，以善政之举谋善治之效。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永续动力。“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国家治理既要勇于革故鼎新，及时完善顶层设计，也应发挥地方在实践创新中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地方治理创新为我国政治改革、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试验样本，实现了单

一制国家政体下地方差异化发展，推动了世界超大规模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提升，为中国道路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

本套丛书是诸位青年朋友学术兴趣的展现和已有学术成果的总结，也是对当下这场跨世纪社会变革的思考与回应，体现了青年学者应有的时代责任与担当。尽管小如苔花，但有前辈时贤的提携与编辑的支持，亦学牡丹开。时代在巨变，改革在继续，创新无止境。“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期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

谨序。

郑万军

2018 年初秋于重庆嘉陵江畔

代序

解构传统中国治理的道德基础

近年来，治理创新或者治理现代化一直是政治学、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热度不减的话题。据理论界和学界的一般看法，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得以实现的关键便是治理的现代化。的确，实现治理现代化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将近 70 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这一话题，在我看来，这一话题不能不说有些沉重。

在直觉上，治理现代化无非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起现代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从而实现有效的现代治理。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似乎是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实践过程中，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社会学有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这一理论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生物有机体，构成社会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相互适应的。这么说来，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当我们致力于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同时，还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环境。这或许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治理创新，可是却没有太多实质性进步的原因。

那么，从传统治理走向现代治理何以如此之难？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传统中国的治理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虽然这个治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我们无法对其做出详尽细致的描述。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以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与那个历史时代流行

的道德哲学明显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那么，两汉以后始终占据政治上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是什么关系，儒家思想在怎样的程度上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本《中国古代的治理基础》所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

作者李锋曾跟随我学习过一段时间，主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难度最大的一部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政治哲学。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其有关朱熹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作者从两汉以后儒家思想哲理化的历史进程入手，就程朱学派的天理论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在常识上，宋代理学家的天理论或许更应该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至于它有什么政治的内涵，以往人们关注并不是很多，这是一个讨论起来很有意义的主题。

本书开宗明义的便是一个十分有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政治学界有一个说法，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时候，政治学开始与伦理学分离开来，因此才有了近代以来政治学的发展。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把政治学看作与道德哲学泾渭有别的独立学科，这肯定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据此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也与道德无涉，却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事物可以自己说明自己，任何东西的价值都需要依据一个相对客观的尺度来判断。如果此说不误，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肯定也不能自我证明的。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是不好的政治，需要我们于现实的政治过程之外建立一个标准来说明。虽然政治评价的标准是多元的，比如，我们可以用经济的观点来评价政治，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人民群众的日子是不是比以前好过了，等等，但在道德哲学家看来，在人们能够想到的诸多评价标准中，最为可靠的还是道德的标准。这是因为，使社会政治生活在道德上来得正当，是古往今来的人们一贯不改的追求。在古希腊，思想家关

注的主题是“正义”，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传统儒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层面的关注便主要体现为历代思想家对道义问题的理解。

中国人对道义问题的关注始于春秋战国，起初，人们是把“道”与“义”这两个概念分别使用的，这两个概念的共同之处是都可以被理解为规则或者原则，而且也都可以当价值判断的标准。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简单地说，“道”是一个更具客观必然性的概念，而“义”则更多地意味着在特定人际关系下人们的行为恰当或正当。到了战国后期，这两个概念才逐渐复合为一个概念。通过对道义概念的理解，先秦儒家形成了自己的道义理念。道义优先，重道义轻利是先秦儒家基本的价值导向。先秦儒家认为，道义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符合道义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这种社会生活状态可以概之为“天下有道”。符合道义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便是“王道”。先秦儒家的这些基本观念，为两汉以后的儒家继承了下来。然而，当汉魏儒家也像先秦儒家那样倡导道义原则的时候，他们却在有意无意间发现，先秦儒家并没有为道的概念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或者说，直到他们生活的时候，仍然没有弄清楚“道义”本身究竟是什么。

关于“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体上有两种认识路径。道家学派注重对“道”的形而上学理解，他们把“道”看作宇宙的本原和普遍法则，《周易》大体上也是用形而上的方式来理解道的，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过，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倾向于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中去理解作为道德原则的“道”，在他们的认识中，“道”就是“先王之道”，是先王留下来的治国原则和治国经验。先秦儒家把道归结为“先王之道”，本意是要借用先王的神圣来证明道义原则的神圣，并由此使得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也能自觉地遵守道义原则。先秦儒家并不知道，他们极力推崇的“先王之道”，即使这种东

西在历史上真实地存在过，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帝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先王之道”并不足以作为万世效法。所以，两汉以后的历代儒家被赋予了一个重要任务，他们需要在先秦儒家所说的“先王之道”以外，为“道义原则”找到一个更为可靠的来处，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理论上说明，他们所倡导的道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法则。于是，如何在普遍必然性的意义上对道义原则做出阐释，便成为儒家道义理念得以进步的关键环节。

汉魏以后的历代儒家对于道义原则理解，主要是围绕“道”的概念展开的。这主要是因为“道”与“义”在最初是被分别使用的，而“道”相对于“义”是一个更具客观必然属性的概念。从西汉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中经唐代韩愈的道统学说，再到朱熹的天理论，是一个逻辑的思想进程，这一思想进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在观念世界里把“道”与“先王之道”相分离，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和把握“道”的过程，也就是把普遍的必然性赋予“道”的概念的过程。在儒家学派内部，只是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那里，“道”才被理解为宇宙的本原和世间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专制国家的治理原则、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政治善恶，都通过“道”或者“天理”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这是传统儒家为中国古代治理所能提供的最为有力的理论支持。作者在讨论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朱熹的政治哲学上，这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治理过程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孙晓春

2018年8月15日

于南开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道德与政治	001
第二节 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的讨论	006
第三节 研究的视角与框架	032
第二章 天理论：普遍道德法则的本体论证明	040
第一节 从“天”到“天理”：道德法则的 形上证成历程	040
第二节 天理：治理的道德基础之本体论依据	056
第三节 “理一分殊”与德行的差异化	071
第四节 普遍道德法则的“涵养体察”之途	079
第三章 性善与禀气：古代德治主义的人性根基	089
第一节 性善论传统的形而上学论证	090
第二节 基于人性假定的人治与等级政治	102
第四章 道义优先：优良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	109
第一节 穷理灭欲：理性宰制欲望	110
第二节 重义轻利：道义优先于事功	120

第三节 以道事君：道义高于权力	132
第五章 王道政治：善治理想及其道德诉求	143
第一节 从“先王之道”到“天理”	143
第二节 王道理想的道德诉求	150
第三节 传统王道思想的双重评价	157
第六章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治理	163
第一节 古代治理的理想价值追求	163
第二节 专制主义政治形态与主体意识的压抑	171
第三节 中国德治主义传统与现代政治生活	182
参考文献	186
后 记	200

第一章 导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立足现代政治发展理念，也要回溯古代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发挥古代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滋养功能。中国古代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德治主义，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治理的道德层面给予深切关注。“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统治者应该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一直是历代思想家反复讨论的问题。”^① 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人们永恒的追求，现代化的治理也必须符合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检视与反思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可以为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第一节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道德与政治

一 治政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道德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各个维度。虽然思想家对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理解，亦无法给出一个科学主义式的确定答案，但是，对社会政治生活做出伦理学解释的价值在于，为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提出道德诉求，为国家治理的好坏善恶提供价值判断，为政治统治的良善做出道

^① 孙晓春：《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初论》，《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德承诺。就此意义而言,政治根本上以道德为基础,“政治不能超越道德价值,独立于善恶之外的政治是不存在的,政治社会必须以社会主流的道德信念为依据为基础为保证”。^①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及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分家,政治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崇尚工具理性的价值,“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高举工具理性的奥卡姆剃刀把德性、自由、公平和正义等价值理性从人的政治生活中剔除出去,导致政治与道德日益分离,政治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②这种主张严格界分伦理与政治的二元分析模式,被用于解读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古代治理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泛道德化与道德泛政治化。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治理中道德与政治的边界是模糊的,它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确立合法性根据的“德化的统治”的治理形态。但是,如果依据二元界分的方法将其全盘否定显然过于简单,这种政治去道德化的观点不仅无助于对古代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也会把现实治理实践引向危险的路途:“它会把政治只变成一人一票的选举游戏,使政治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都无所承诺,导致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缺席,若再没有传统道德力量作为砥柱,政治便可能把社会引向道德混乱。”^③显然,站在民主政治与治理理念的立场上,古代治理所崇尚的尊卑、等级等伦理道德观已经不能再被接受,但是,现代国家治理与政府事务仍要追求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从而保证政治之治的目标和结果是行德为善。就这一点而言,现代治理与古代治理具有一致的追求。如果否认了这一点,治理的正当性就无从谈起,政治本身也会变得冷酷和残暴。

① 陈来:《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物质》,《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② 曹玉涛:《政治与道德:政治哲学伦理向度的反思和重建》,《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陈来:《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物质》,《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在中国的古代治理中，治国理政要遵循政治的道德，即政治应受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同时，理想的治理形态是一种道德的政治，即政治体现了道德的要求和目标。在此，道德不是政治的手段，而是政治存在的前提，是政治的灵魂，政治与道德完整地契合为一体。“‘道德的政治’是要建立以‘道’为导引、以‘德’为贯通、以‘仁’为内核、以‘礼’为框架的融个人、国家、天下为一体的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是以家国天下的整体和谐为根基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① 这种德治主义的实质是以“道德的政治”为指向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虽然有批评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实际上是“阳儒阴法”之治，“秦以前，儒自儒，法自法，世主能苦儒不能亡儒。自叔孙通首以法乱儒，媚泗上群盗，而武帝时曲学以阿酷吏者加甚焉，于是儒法混而儒乃几亡”。^② 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德治主义的引导和规制，否则中国政治史将会呈现黑暗残酷的面相。

二 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善政之治

儒家政治哲学为中国传统德治主义提供了思想支撑。政治哲学本质上是以哲学的方式解读政治，“是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好坏之别的价值判断，它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支撑，即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念基础”。^③ 中国自商周之际已经开始尝试思考并回答此类问题，此时形成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观念都成为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思想资源。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思想家针对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也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儒家思想在此阶段开始系统地反思伦理政治问题，“先秦儒家对于‘天下有道’的追求使

① 荆雨、魏书胜：《先秦儒家“道德的政治”之价值理想及其当代意义》，《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

② 宋恕：《赠谭复生》，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3页。

③ 陈晏清：《政治哲学的时代使命》，《求是学刊》2006年第3期。

其‘道德的政治’拥有普遍而超越的道义原则，其对德性内涵的不断追寻则使其德治主张在政治实践中得以落实和发展”。^①秦汉以后，儒家的德治学说确立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其进步则主要表现为哲理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即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释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生活所要遵守的道德原则提升到本体论层面，德治学说也逐渐发展成为内容完备的理论体系。

儒家政治哲学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政治的普遍道德法则。思想家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是其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前提。儒家强调政治与道德不可分离，政治有其应遵循的“一贯之道”。“道”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抽象的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价值，只有遵循和实现“道”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孔子常用“有道”“无道”来品分国家治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②“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③有道是理想的治理状态，称为“王道”，而无道则是对政治最严厉的批评。有道和无道是儒家对治理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判断，表达了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普遍道德法则的追求和坚持。通过对道德法则的认识和理解，儒家又发展出了一整套“道义优先”的思想观念，“志意修而骄富贵，道义重而轻王公”。^④道义是国家治理应坚持的首要价值，任何权力和功利的目的都不能成为侵犯道义原则的理由。中国思想史上持续的“王霸义利之辨”，即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关注和不同理解。

儒家政治哲学把人的道德属性作为治理的人性论基础。思想家对人性做出的判断决定了他主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人。“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在每一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生活总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

① 荆雨、魏书胜：《先秦儒家“道德的政治”之价值理想及其当代意义》，《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

② 《论语·季氏》。

③ 《论语·公冶长》。

④ 《荀子·修身》。

他人，同样，每一个人也都应受到符合道德的对待。因此，合乎道德便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而社会政治生活所以能合乎道德，在于每一个人都是道德自律的主体，人类的群体生活之所以能够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此。”^① 儒家把人视作具有道德能力的存在，即“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人。“‘道德人’是指具备道德能力的人，指能够知善恶，明是非，具有道德判断的能力，并愿意服从道德要求的人，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主动承担道德责任的人。”^② 因此，通过教化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便成为提升社会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大学》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要求执政者修养自身的美好德行，垂范教化社会民众提升其道德品质，最终达到“至善”的理想治理状态。至此，儒家把政治的道德与个人的美德结合为一体。

儒家政治哲学还要求以符合道德的方式治理国家。仁政是儒家德治主义治理思想的核心主张，优良的治理应施慈爱之心于万民百姓。儒家思想家始终对法家的“非道德政治观”持有警惕和批判的态度，认为桀纣式的酷政、暴政从根本上是失去了道德的指引。因此，统治者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权力，如此才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进而才能兴德教、施仁政、兴民利。在如何才能以符合道德的方式治理国家这一问题上，儒家给出的答案是执政者要做道德典范，要有追求和实现道德价值的理想和信念。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③ 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④ 显然，儒家学

① 孙晓春：《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初论》，《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② 曹玉涛：《政治与道德：政治哲学伦理向度的反思和重建》，《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朱熹：《答陈同甫》之九，《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0页。本书引用朱熹著作时，只在第一次注明作者、出版社、年份。

④ 《论语·颜渊》。